

Outstanding Academic Works on Economics by Nobel Prize Winners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学术精品自选集



ASIAN DRAMA

—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by

GUNNAR MYRDAL

AN ABRIDGMENT *by* SETH S. KING

亚洲的戏剧

——南亚国家贫困 问题研究

(重译本)

[瑞典] 冈纳·缪尔达尔 著

塞思·金 缩写

方福前 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ASIAN DRAMA

—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亚洲的戏剧

—— 南亚国家贫困
问题研究

(重译本)

[瑞典] 冈纳·缪尔达尔 著

塞思·金 缩写

方福前 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Asian Drama—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 The City of Stockholm by Its Division of Culture

根据 Vintage Books 1972 年版翻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瑞典)缪尔达尔
(Myrdal, G.)著;方福前译. -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1.7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学术精品自选集)

书名原文:Asian Drama—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ISBN 7-5638-0882-5

I. 亚… II. ①缪… ②方… III. 贫困—研究—南亚
IV. F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0635 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

北京通县宏飞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352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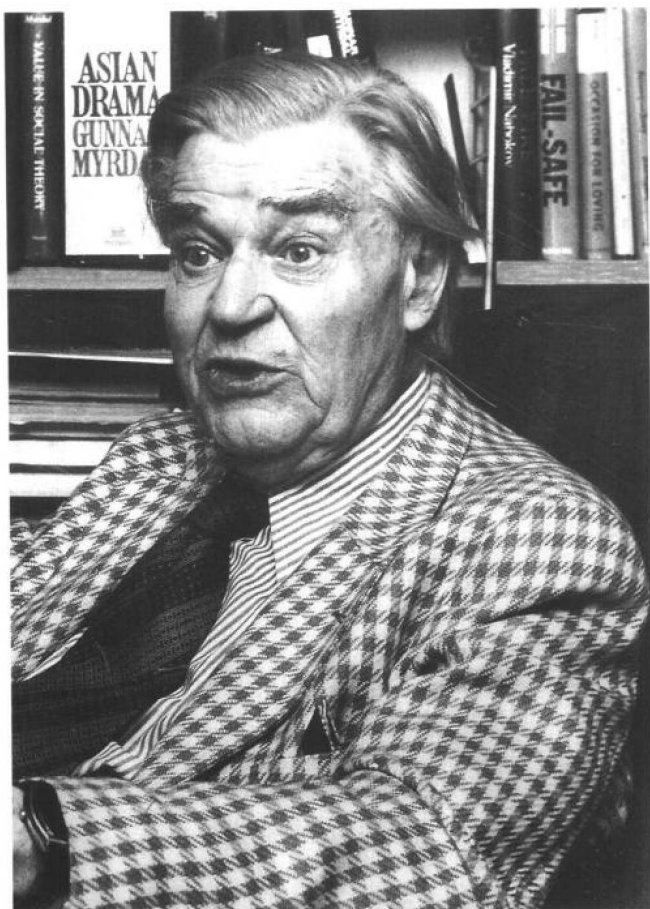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38-0882-5/F·48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1999-1492 号

定价:32.00 元



冈纳·缪尔达尔 Gunnar Myrdal (1898~1987)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1974年因其在“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成就”，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出版说明

1968年在瑞典中央银行成立300周年之际,为纪念诺贝尔奖奖金提供者,由时任行长艾斯伯林克等人倡议,并经瑞典皇家科学院批准,设立了“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中央银行经济学奖”。该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委任的5~8名经济学家组成“经济科学委员会”(即奖项委员会),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对入围的经济学家进行遴选并将评选意见提交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最终确定桂冠的得主。由于该奖项与诺贝尔遗嘱所设立的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物医学奖、文学奖以及和平奖以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奖金额颁发,故被世人习惯地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划时代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然而,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前,人们对能否称经济学为科学尚怀有极大的疑问,即使在艾斯伯林克等人提出设立经济学奖时,也遭到许多名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以它的

价值判断为基础,其成就难以用一定的客观标准来衡量。因此,尽管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促进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已显示出极大的作用,但并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首次使经济学奖与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物医学奖、文学奖以及和平奖并驾齐驱,每年颁发给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它的设立,对经济学在门类众多的学科中确立自己应有的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今天,诺贝尔经济学奖已被世人极为关注,尤其在经济学界更被奉为至尊。从1969年首次颁奖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至今已颁发了31届,共有44位经济学家获此殊荣。获奖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可谓集西方经济理论之大成,几乎囊括了二战后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成果,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具有积极、重要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各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归纳和总结。作为人类经济思想的精华,其成果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对中国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加速经济发展具有无可辩驳的借鉴作用。因此,我们应注意研究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并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也是我们出版本丛书的初衷。

考虑到许多获奖者笔翰如流,著作等身,为使收入到丛书中的作品更具权威性,我们采用了由获奖者自己

选择作品的方式确定书目。对那些业已仙逝的获奖者,则邀请其家人、同事、学生或国内专家学者代为确定作品。尽管这样做使得我们的工作变得异常艰辛,但这却是本丛书的特点及价值所在。

在本丛书面世时,我们由衷地感谢那些为本丛书的出版提供过帮助的机构和人士,他们是:瑞典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及杨更琪先生、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挪威驻华大使馆文化处、荷兰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业务开发及礼宾事务经理刘国来先生、瑞典皇家科学院经济科学委员会及托尔斯滕·珀森先生、北京大学图书馆沈正华女士等。没有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本丛书的顺利出版是不可想像的。我们还要感谢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及有关领导,他们对出版本丛书的支持为我们出好丛书提供了保证。我们更要感谢欣然允诺担任本丛书顾问及编委的学者们,他们的亲切指导,特别是为我们推荐能够胜任翻译工作的译者,对保证丛书质量起了关键作用。此外,我们还要感谢许许多多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希望本丛书能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承认,如果是那样,我们将深感欣慰。

出版者

2000年3月

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学术精品自选集》所作的序言

1968年,瑞典银行(Sverigs Riksbank)在其300周年志庆活动时宣布设立一个新的奖项,即“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中央银行经济学奖”,并承诺对该奖项提供永久支持。

同时,瑞典皇家科学院承担了与自1901年起开始运作的诺贝尔奖完全相同的程序来对获奖者进行评选的任务。这样,每年年初科学院都会收到250~300个提名建议,通常涵盖多达百名以上的候选人(未经邀请主动提名的个人没有计算在内)。科学院奖项委员会(成员5~8名)首先对世界各地的候选人进行专业评估,然后,再以报告的形式将奖励意见提交给科学院社会科学部(The Social Science Class of the Academy)。最后,科学院的全体成员要在10月份齐集一堂,以决定奖项的最终归属。

本奖项的评选原则与诺贝尔奖完全一致,完全遵循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愿——奖励在其所处领域有最为重大发现、发明或发展的科学家。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要考虑到参选者学术成果的独创性、在理论与实践当中的重要性及其对科学工作的影响。科学院及奖项委员会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候选对象及其学术成果对社会的影响,包括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在本奖项设立后的前 30 年里,科学院及奖项委员会对“经济科学”一词采取了相当广泛的理解。因此,奖励对象涉及经济学邻近学科的很多重大科学成就。有几个奖项实际上是授予了“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处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及历史学等学科的交叉点。

本奖项设立后 30 年的运行也反映出本世纪下半叶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与走向。首先,获奖情况清楚地表明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43 名获奖者中,有 28 人是美国公民,尽管其中 4 人,即里昂惕夫(Leontief)、库普曼斯(Koopmans)、德布鲁(Debreu)和哈萨尼(Harsanyi)的出生地及受教育地均非美国。其他获奖者来自英国(6 人),瑞典、挪威(各 2 人),法国、印度、荷兰、前苏联、德国(各 1 人)。获奖一人次以上的大学有:芝加哥大学(8 人)、哈佛大学(4 人)、剑桥大学(4 人)、麻省理工学院(3 人)、伯克利大学(2 人)、奥斯陆大学(2 人)、普林斯顿大学(2 人)、斯坦福大学(2 人)、耶鲁大学(2 人)。

在获奖成果的内容方面,经济分析中的演绎法与数

学公式化表述成为其显著特征。例如,萨缪尔森(Samuelson)、希克斯(Hicks)、阿罗(Arrow)、库普曼斯、康托罗维奇(Kamtorovich)、德布鲁、阿莱斯(Allais)等人的获奖,还有金融经济学方面的获奖者马克威茨(Markowitz)、米勒(Miller)、夏普(Sharpe)、默顿(Merton)和斯科尔斯(Scholes),以及博弈论研究方面的获奖者哈萨尼、纳什(Nash)、泽尔滕(Selten)等。

20 世纪下半叶,经济学研究的趋势和特点之二是包括系统统计测试或评估等在内的定量研究法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主要反映在授予弗里希(Frisch)、丁伯根(Tinbergen)、里昂惕夫、克莱因(Klein)、斯通(Stone)、哈维尔莫(Haavelmo)等人的奖项上。实际上,在过去 10 年间,定量研究领域的硕果涉及了大量的数据,如果没有分析技术手段的发展(如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程序编制、高能计算机等的发展和应用),要想取得这样的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奖项还反映出二战后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在此,我们应特别注意弗里德曼(Friedman)、克莱因、托宾(Tobin)、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索洛(Solow)和卢卡斯(Lucas)等人的成就。一些研究经济体系的新方法得到了认同,这反映在奖项授予信息经济学[米尔利斯(Mirrlees)、威克里(Vickery)]、人力资源[贝克尔(Becker)]和博弈论等研究课题上。定量研究法在经济史学研究中的不断上升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库兹涅茨

(Kuznets)和福格尔(Fogel)的获奖上。同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制度的重要作用则体现在授予冯·哈耶克(Von Hayek)、布坎南(Buchanan)、科斯(Coase)和诺斯(North)等人的几个奖项上。对经济发展不同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奖励则授予了缪尔达尔(Myrdal)、刘易斯(Lewis)、舒尔茨(Scholtz)和森(Sen)等人。

据我所知,此套丛书是首次尝试系统地出版所有获奖者的重要著作。丛书的出版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中国面世其意义更加深远。我希望它的出版不仅有助于经济学的发展,而且能直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奖项委员会秘书

托尔斯滕·珀森

1999年7月,于斯德哥尔摩

导 读

读者如果不看本书的副标题和内容,可能认为这是一本有关戏剧方面的著作。实际上,这是一本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撰写的专门研究亚洲国家贫困与发展问题的学术名著。

本书作者及其主要著作

本书作者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 1898~1987年)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代表人物,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先驱。他因在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方面的贡献以及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等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而获得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缪尔达尔于1898年12月6日出生于瑞典中部的达拉纳(Dalarna)省的古斯塔夫(Gustaf)教区,祖籍芬兰。其父亲是铁路建筑公司职员,母亲是家庭主妇。

缪尔达尔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家乡农村度过的。1918年,他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法律,1923年毕业后以律师为职业。在任律师期间,他同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研读经济学,师从瑞典

学派的奠基人之一的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 1866~1945年), 1927年获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 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 1931~1932年在日内瓦国际研究院任副教授, 1933~1939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卡塞尔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

缪尔达尔最初在经济学方面的兴趣是微观经济学, 尤其是厂商行为和厂商计划。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价格形成以及对利润和资本价值变化的影响, 他把不确定性和预期纳入厂商的决策分析。1929年10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使缪尔达尔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重点由微观经济学转向宏观经济学, 尤其是经济波动问题和制度经济学。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是在美国完成的。大危机爆发的这一年, 他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赴美国作访问研究。

1934年, 缪尔达尔回到瑞典。此后, 他一方面倾心于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另一方面积极活跃于政坛。他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 著作等身; 在政界也春风得意, 数度身居要职。他是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 1934年当选为瑞典议会参议员(任期为1935~1939年)。

1938年, 受卡内基公司邀请和资助, 缪尔达尔再度来到美国, 专门就美国黑人问题进行了长达4年的大规模调查研究。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于1942年完成, 1944年由纽约的哈珀出版公司出版, 这就是《美国的两难处境: 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缪尔达尔出任瑞典银行董事长。1942年, 他第二次当选为瑞典议会参议员(任期为1943~1947年)。1943~1945年, 他出任瑞典政府战后计划委员会主席。1945~1947年, 他接替瑞典学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俄林(Bertil Ohlin)出任瑞典政府商务部长。

1947年初,缪尔达尔离开瑞典,出任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秘书长。他担任此职长达10年。

1953年,由于要与联合国新成立的亚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和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进行合作,缪尔达尔有机会访问了南亚诸国,由此引发他对亚洲和其他欠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兴趣。为了专心于南亚国家贫困和发展问题研究,缪尔达尔于1957年辞去了在联合国担任的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对南亚、中国西部和前苏联西南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的发展问题研究,其重点是研究印度等亚洲诸国。在二十世纪基金会(纽约)的资助下,这项研究工作持续了整整10年。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就是《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

1961年,缪尔达尔返回瑞典,受母校斯德哥尔摩大学之聘担任国际经济学教授;同时,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筹建国际经济研究所,并出任所长。

缪尔达尔一生获得30多个荣誉学位,并于1945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74年,他和奥地利学者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分享了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1924年10月8日,缪尔达尔与阿尔娃·蕾默(Alva Reimer)结为夫妇。蕾默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1970年,缪尔达尔夫妇荣获西德和平奖章。1982年,蕾默获诺贝尔和平奖。夫妇同获诺贝尔奖,这在诺贝尔奖颁奖历史上是罕见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本著作外,缪尔达尔的主要著作还有:《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1930年瑞典文版,1953年英文版);《瑞典的生活费用:1830~1930年》(1933年英文版);《货币均衡论》(1933年瑞典文版,1939年英文版);《财政政策的经济效果》(1934年瑞典文版);《人口:民主问题》(1940年英文版);

《关于政府间组织的现实与假象》(1955 年英文版);《发展与欠发展:论国内与国际不平等的机制》(1956 年英文版);《国际经济学:问题与前景》(1956 年英文版);《经济理论与欠发达地区》(1957 年英文版);《社会理论中的价值:方法论论文集》(1958 年英文版);《超越福利国家》(1960 年英文版);《挑战丰裕》(1963 年英文版);《社会研究中的客观性》(1969 年英文版);《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计划纲要》(1970 年英文版);《欠发达国家中的软弱国家》(1970 年英文版)和《反潮流:经济学批评文集》(1972 年英文版)。

本书主要内容

《亚洲的戏剧》一书完成于 1966 年初,1968 年由设在美国纽约的二十世纪基金会出版。

当时这本书共 3 卷,长达 2 300 页,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长篇巨著。为了将缪尔达尔的这个研究成果以一种简短、可读的形式提供给读者,尤其是提供给本书所论及的亚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二十世纪基金会董事局决定在 3 卷本的基础上再出版一部 1 卷本的缩写本。经过塞思·金(Seth S. King)的缩写和缪尔达尔的审定,1 卷本的《亚洲的戏剧》于 1971 年用英文出版。本书就是根据这个缩写本翻译的。

本书主要研究南亚国家贫困的原因和如何脱贫、如何发展的问题。缪尔达尔在本书所说的“南亚”或“南亚地区”主要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锡兰(1978 年改称斯里兰卡)、缅甸、马来亚(1963 年和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1965 年新加坡宣布退出)、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还包括越南、柬埔寨

寨和老挝。因此,本书所说的“南亚”比我们地理书上所说的南亚包含的国家要多得多。根据地理学上的划分,南亚诸国一般只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这5个国家。本书涉及的11个亚洲国家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所以,本书比较恰当的副标题应当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

本书共5篇27章,其内容涉及发展经济学的方方面面:资源、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与国民收入;农业、手工业和小型工业与经济发展;工业化问题;不平等问题;教育、卫生保健与人力资本投资;发展计划;对外贸易与利用外资。

与笔者研读过的发展经济学论著相比,本书所讨论的以下两个问题是一般的发展经济学著作所没有的或语焉不详的。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极为重要的。

1. 发展经济学兴起的原因和目的何在

对欠发达国家进行研究原来是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才开始热衷于研究欠发达国家的不平等、贫困和发展问题,并由此促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缪尔达尔把它归结为3个方面的原因:殖民制度瓦解以后欠发达国家本身渴望发展;那些出于自身利益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人们渴望发展;在冷战中达到白热化程度的国际对抗关系使得欠发达国家的命运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政策所关注的问题。本书作者认为,第三个原因是引起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学者及其学术机构对欠发达国家问题感兴趣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的国际对抗关系中,争取到欠发达国家或至少让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对西方国家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政治重要性。这就使得对欠

发达国家的研究含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现在对欠发达国家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经常是出于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的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利益或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了普遍和永恒的价值。本书作者批评说:“在对穷国进行经济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数研究力图按照西方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观点——把穷国从共产政权中拯救出来,来看待穷国的内部问题。”(本书第6页)

2. 用什么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主要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这种研究传统实际上是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一般命题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本书作者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研究传统。他批评说:“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更倾向于得出一般性的命题,然后假定这些命题对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和任何文明都有效。”(本书第8页和第9页)他认为:“只要这些理论(西方经济理论——译者)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南亚欠发达国家——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本书第9页)他的基本观点是:市场与价格、就业与失业、消费与储蓄、投资与产出这些“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用于分析欠发达国家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欠发达国家,不能进行这种抽象;实际的分析必须讨论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本书第9页)我们认为,本书作者的研究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作为一位西方学者,能够持有这样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作者的这